

马明达 主编

暨南史学

道堂題辭



【第六辑】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马明达 主编

暨南史学

【第六辑】

道堂題端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暨南史学 (第六辑) / 马明达主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1135 - 493 - 5

I. ①暨… II. ①马…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5072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2.75

字 数: 796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63.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暨南史学》

指导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卫思韩（美国）	韦庆远（北京）	西田龙雄（日本）
朴元燯（韩国）	朱维铮（上海）	克恰诺夫（俄国）
张 磊（广东）	陈学霖（美国）	陈高华（北京）
陈得芝（江苏）	季塔连科（俄国）	饶宗颐（香港）
姜伯勤（广东）	徐 泓（台湾）	黄一农（台湾）
黄时鉴（浙江）	萧启庆（台湾）	萨安东（葡萄牙）
章开沅（湖北）	普塔克（德国）	谢和耐（法国）
蔡鸿生（广东）		

《暨南史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马明达

副 主 编 范立舟

编 委（以下均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明达 马建春 王元林 刘正刚 刘增合 纪宗安 张其凡
张晓辉 陈伟明 陈奕平 范立舟 郭声波 冀满红

特邀编委

金国平（葡萄牙） 钱 江（香港） 韩 琦（北京）
崔 丕（上海）

编 辑 室

主 任 马建春 执行编辑 刘永连 李新华

目录

Catalogue

一脉天风，百丈清泉——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建系八十周年学术传承回顾 冀满红 王 利	1
小小源流 动成掌故——朱杰勤先生致王贵忱先生的五封信 林 锐	5
深圳咸头岭遗址的生态环境与人们的谋生方式 赵善德 黄小茜	12
西周时期盟誓的制度化 卢中阳	36
从所载子思言行看《孔丛子》的伪书本质——兼说疑古派观点的价值与意义 李健胜	43
公孙源流考 赵晓龙	55
岭南“陶瓦筑堵”说试解 孟宪军 刘永连	59
山西汉代城址研究 王银田	67
仇池诸国通考 刘雁翔	91
略论北魏前期音乐及其影响 翟景运	113

以高欢家族为例看东魏北齐汉化

黄寿成 124

试论北朝时期的政治性救灾措施

李 辉 132

唐代胡僧考源

介永强 145

唐朝岭南道容管地区行政区划沿革

郭声波 郭姝伶 154

宋人著作补正（60种）

李裕民 184

西夏禅宗文献的多样性和禅教的融合

束锡红 211

元代的裱背工艺

马明达 222

阿拉伯、波斯语文在元明两朝官方的教习与运用

马建春 244

明代宗藩经济犯罪述论

雷炳炎 257

于慎行史学著述考论

范知欧 268

《吴渔山集笺注》补订

胡文辉 284

困顿与坚守：利玛窦广东行教的心态史考察

王 睿 287

清代以前中国古籍有关马来西亚的记述以及史料价值

张应龙 296

在清与明之间徘徊：顺治时期广东社会考察 刘正刚 乔玉红	313
清代直隶的留养局及其运作机制 吴宏岐 郝红暖	326
清朝时期澳门议事亭研究 刘冉冉	345
清代中叶中国政府对澳门华人的管理 张廷茂	355
近代美国教会学校与中国体育 马廉祯 耿之矗	377
近代中国的官营企业与香港 张晓辉	395
18 世纪瑞典的中国趣味与中国宫的建造 江滢河	410
1901 年西人在陕赈灾活动考述——以美国赈款的散放为中心 史红帅	423
平等与不平等之间——中西外交礼仪之争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艰难起步 李云泉	436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述论 杨 琪	454
日据时期马来亚印度人的独立运动简析 石沧金	470
“近代墨学”研究述评 张永春	482

战时中美技术贸易之一例：以资源委员会与美国亚克屈勒电子管公司的合作为中心

张维缜 吴布林 499

理论运用的时代错位——杜能模型与中世纪英格兰的领主经济

李云飞 508

一脉天风 百丈清泉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建系八十周年学术 传承回顾

冀满红 王 利

暨南大学是一所素以重视科研学术见长的综合性大学，各院各系都十分注重学术的发展，历史学系尤为突出。历史学系成立于1928年，至今已历八十多个春秋，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特色，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既勇于开拓，又严谨求实。在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八十年的历程中，先后有周谷城、周予同、陈高慵、沈炼之、谭其骧、朱杰勤、金应熙、陈乐素等史学大师在本系执教，就体现了这种学术传统和特色的传承。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成立之初，学术气氛就非常浓厚。在黄凌霜、许德珩主任的指导下，谭其骧和周镜吾等同学成立了历史社会学同学会，创办了《历史社会学两月刊》，吸引众多的历史社会学爱好者参与其中，同时还开展野外考古活动等，这些活动既开拓了师生的学术视野，增长了他们的学术阅历，又活跃了系里钻研学术的气氛，培养了学生钻研学问、探究历史的良好志趣，也推进了系里的学术研究，为以后历史学系的学术研究氛围定下了良好的基调。此后，史学大师一个个走进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培养和加强了历史学系勇于开拓、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和特色，为历史学系的崛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又深厚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在历史学系执教的史学名家有周谷城、周予同、陈高慵三位先生。周谷城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7—1930年在暨南大学附属中学和中国公学任教。1932年，周谷城来到暨南大学，从这年秋天到1933年夏担任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周谷城学术视野开阔，研究领域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主张研究应注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强调“历史完型论”。1935年，暨南大学组织《中国通史》编纂委员会，以何炳松、郑振铎、周予同、陈高慵、周谷城等为委员，由周谷城编著成书。在《中国通史》中，周谷城提出了见解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强调史论结合，阐述与论证融为一体。他能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鸟瞰中国历史的变迁，使用对比的手法纵论中外历史，给人以宽阔的视野和对历史规律的系统认识，受到了历史学界的好评。该书先在校内油印，后由开明书店出版，被很多高校用为教材，供不应求，以后还在香港、澳门、台湾及国外发行。除《中国通史》外，周谷城还于1933年出版了《实验主义伦理学》，1939年出版了《中国政治史》，这两本著作同样影响很大。这个时

期，周谷城还发表了《现代中国经济变迁概论》、《近代欧洲政治演变之动力》等多篇论文。直到1942年秋，周谷城才离开暨南大学，去了复旦大学。

周予同少年时就读于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后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因此他不仅精通经学，受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影响也比较深。周予同认为：“使青年学人超脱传统的学派偏见，从历史入手，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不致老是陷在‘落后的’泥沼里，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学术思想工作。”由此在1935年到暨南大学任教后，周予同仍对经学研究不辍，出版了《群经概论》、《孔子》等著作，以及大量贯穿着其实事求是的研究风格的论文，如《治经与治史》、《道儒的党派性》等。1935年，暨南大学组织《中国通史》编纂委员会，时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的周予同与何炳松、郑振铎、陈高儒、周谷城等同为委员，由周谷城编著成书。1936年，在校长何炳松倡导下，《暨南学报》创刊，并成立了“国立暨南大学编译委员会”，周予同担任主席，负责学报的编印、出版工作。1937年8月，历史社会学系改为历史地理学系，周予同继续担任系主任。1940年，周予同兼任暨南大学教务长，同年还被学校邀请与金兆梓、郑振铎等十余人组成“学林月刊编辑委员会”，创办《学林》月刊，于当年11月出版了第1辑，周予同本人的《五十年来中国的新史学》载于第4辑中。1942年，暨南大学迁至福建建阳，周予同也随校去了建阳，此时他还身兼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丛书编纂委员会委员。在这几年当中，周予同一方面继续研究经学史，另一方面为编写教材花了大量心血，编写了《本国史》、《国文教科书》等，此外还撰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1943年，周予同离开暨南大学，先在开明书店任编辑兼襄理，1945年又到复旦大学当教授。

陈高儒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大约在1935年至1940年担任暨南大学教授。1935年1月10日，陈高儒与王新命、何炳松、武育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樊仲云、萨孟武共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认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是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主张不守旧，不盲从。“十教授宣言”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陈高儒等十位教授于1935年5月10日发表文章《我们的总答复》，认为“我们所揭橥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在纵的方面不主张复古，在横的方面反对全盘西化，在时间上重视此时的动向，在空间上重视此地的环境，热切希望我们的文化建设能和此时此地的需要相吻合”。陈高儒本人认为，“文化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总汇，而亦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因此非常关注中国文化的 research 问题。他在暨南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把在教学中遇到的许多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于1937年1月写成了《中国文化问题研究》，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6月出版发行。从1936年起，陈高儒在暨南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经过4年的编纂，于1940年由“国立暨南大学研究委员会”作为“国立暨南大学丛书”出版，他任主编。该书共10册，1600余页，将自秦至清2000余年的天灾人祸，分为水灾、旱灾、内乱、外患等六部分，用中西历对照，以年表形式记录，书末附有各代灾祸统计图表30余幅。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中国通史、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水利史、气候学的学科重要参考书，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把它列为参考书。该书问世后直到今天，一直被有关学科的学者参考引用，历久不衰。经过上述三位大师

十多年的身体力行，身教言传，终于形成了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勇于开拓、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和特色。

20世纪40年代，沈炼之和谭其骧先后来到暨南大学，他们在历史学系的任教，进一步发展了勇于开拓、严谨求实的学术传统和特色。

1943年8月，沈炼之应聘到暨南大学任教，先后担任暨南大学史地系主任、文学学院院长、代理校长等职，直到1948年才离开暨南大学。他在暨南大学的五年任教生涯中，开设有西洋思想史、法国史、西洋文化史等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学术研究上受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当时学术研究的影响，他也更讲究求实创新，密切关注世界局势的发展，翻译和出版了《世界文化史》和《罗曼·罗兰传》等多部世界名著，成为海内外的知名学者。他在讲授西洋通史时，着重讲述西洋文化史，J. E. 斯温著的《世界文化史》最初就是作为西洋通史课的教本在闽南由他翻译并于1944年出版的，出版后极受读者欢迎，后经周予同先生推荐，于194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重版，1949年再版。此书从远古叙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内容十分丰富，结构条理清晰，在当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对推进我国的世界文化史研究，传播世界文化史知识，起了启蒙和开拓的作用。抗战胜利后，沈炼之随暨南大学于1946年从建阳迁回了上海。1948年，沈炼之离开暨南大学，返回故乡温州中学任教。

谭其骧是暨南大学社会历史系学生，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编辑学术刊物，1947年受聘为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讲中国沿革地理、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史学史等课程。正是在这一阶段，他完成了《秦郡新考》、《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等文，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基础。谭其骧的学术研究讲究论从史出，各项研究都有其独到见解，后来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著名学者。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展开，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平台。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系又有朱杰勤、金应熙、陈乐素等史学大家执教。他们在这个新的自由开放的学术研究环境中，秉承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将历史学系的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朱杰勤在来暨南大学之前已是中山大学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参加了暨南大学1958年在广州的重建，1959年至1970年担任暨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在这段时期，朱杰勤主要致力于中外关系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著有《亚洲各国史》，还翻译出版了《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大秦国全录》，发表了《泰国华侨的经济状态（1948—1956）》、《十九世纪中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契约华工》、《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明末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击退荷兰侵略者的记录》、《一七四〇年印度尼西亚华侨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等论文，使他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1970年暨南大学停办，朱杰勤先后到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大学工作，1978年暨南大学复校又回来任教，直到1982年调任本校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这期间朱杰勤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翻译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译丛》，还发表了《中国与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其处境》等学术论文，为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金应熙早年在香港大学读书时师承著名的文史学家许地山先生，后又受到陈寅恪、

马鉴、陈君葆等人的影响，孜孜不倦地探索追求，自身就形成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术风格。1978年，金应熙来到暨南大学，担任历史学系主任，直到1984年才卸任。金应熙在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还在史学园地辛勤耕耘，发表了《十九世纪前半叶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略的两次起义》、《十九世纪中叶前的越南华侨矿工》、《越南历代封建王朝对老挝的控制和侵略》、《别了，殖民主义时代——论香港怡和财团的兴衰及其启示》、《关于香港史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等学术论文。

陈乐素是我国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宗师、著名教育家陈垣之子，受家学熏陶甚深，主攻宋史，在学术上多有造诣。1979年，陈乐素来到暨南大学，任历史学系教授，并担任宋史研究室主任，直到1984年调任本校古籍研究所所长。陈乐素在学术上异常严谨，从而也在不自觉中传递了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他在研究中重视材料，主张让史料说话，每有著述，必先大量搜集有关史料，进行考订、分析、取舍等，最后成文，继而又以文稿广事商榷，征求意见，几经删改，方肯刊布。在历史学系执教期间，著有《求是集》等，先后发表了《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珠玑巷史事》、《袁本与衢本〈郡斋读书志〉》、《桂林石刻〈元祐党籍〉》、《略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等学术论文，都是高水平之作。陈乐素的宋史研究持续近六十年，不愧是一代宋史名家。

在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八十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位史学前辈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认真钻研学术，形成和发扬光大了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而且还注重学术传承，培养了大量的学术传人。这些学术传人如今都已是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建树成林，在学术界享有声誉。他们传承着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和特色，推动着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研究继续向前发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如今的暨南大学历史学科已经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还获批了历史学科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工作站。此外，历史学二级学科专门史和中国古代史还是省部级重点学科。暨南大学历史学科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江山代有才人出。老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数代学术精神血脉，将会代代相传，永不枯竭。可谓一脉天风，百丈清泉。

（作者：冀满红，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利，暨南大学历史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小小源流 动成掌故

——朱杰勤先生致王贵忱先生的五封信

林 锐

著名历史学家、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创办者朱杰勤先生（1913.6.12—1990.5.9）与著名文献学家、可居室主人王贵忱先生相交近三十年，关系密切。在可居室珍藏的师友手札中，有五封朱杰勤先生晚年的来信，见证了两位学者的交往，并记录了朱先生晚年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该批信札为朱杰勤先生亲笔，用钢笔书写在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原稿纸上。最早的一封写于1986年5月13日，最迟的一封作于1990年2月8日，下距朱先生逝世仅三个月零一天的时间。蒙马明达教授相邀，现影印发表并略作诠释如下。

5

朱杰勤先生之于王贵忱先生，谊在师友之间。而两人的交往，则缘于对龚自珍研究的共同爱好。

据王先生回忆，他与朱先生的订交时间较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因购买《龚定庵集》而邂逅于广州文德路古书店。此后两人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每次见面必谈龚学（王贵忱：《龚自珍与晚清钱币学——朱杰勤教授逝世八周年纪念》，《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可居室所藏这五封朱先生的来信印证了王先生的这一说法。在这五封来信中，就有四封与龚自珍研究有关。第一封是1986年5月，王贵忱先生在其撰写的《龚自珍初刻本诗集〈破戒草〉》一文在《广州日报》发表后，将其寄呈朱先生指正，朱先生在百忙之中回信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建议加上版本插图，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第三封是1986年12月，朱先生将手头唯一一本自己的著作《龚定庵研究》出借给王先生；第四封的末尾则提供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信息，就是晚年的朱先生仍一直坚持对龚自珍的研究，并曾经撰写过长约三万字的论文《龚自珍师友记》。在信中，朱先生还向王先生建议合作编写《龚自珍研究资料》一书。此后两位先生曾约定在次年的春节下榻于可居室，共同编写《龚自珍研究资料》书稿，不料朱先生在春节后不久病作以致不起，此事遂成为他一未了的心愿，《龚自珍师友记》最后也未见发表，其手稿不知去向。在第五封中，朱先生不但还惦记《龚自珍研究资料》的编写，而且亲自抄录了晚清广东著名诗人张维屏的一首《龚定盦中翰（自珍）招同诸词人集龙树寺》，供王先生研究时参考。

朱杰勤先生出生于民国初年，其所接受的教育具有该时代的明显烙印。他在童年时先后接受传统的家庭及私塾教育，14岁时转到英文学校求学，数年后辍学，在商店里充当杂役，工余报读商务印书馆开设的函授学校，读完中文、英文、数学、商科等专门课程。1933年投考中山大学研究院，在朱希祖先生的指导下从事秦汉史的研究（杨安尧：《朱杰勤传略》，见林远辉编：《朱杰勤教授纪念论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正因经历了早年的传统教育和后来的院校专业训练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朱先生才具有独特的知识结构，他不但能够掌握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熟谙外语，通晓外国历史，而且在传统的经史和诗文方面也有着深厚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讲，传统文人和现代学者的不同特质在朱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实现自己所提出的沟通中外、通古今之变的治学主张。这一特点体现在他的治学领域上，就是他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历史学一门，而是旁通其他多种学科。因此，他不但在中外关系史、中外交通史、南洋史和华侨史等方面均有高深的造诣，成就卓著，在其他诸如美术学、中外文学、龚自珍等不少研究领域也多有建树，成绩斐然。朱先生的学生林远辉曾编有《朱杰勤教授著译目录》（见《朱杰勤教授纪念论文集》附录），尽管该目录所收录朱先生的著述并不太完备，但我们仍可从中窥见其学问的广博。

在朱先生历史学以外的众多研究成果中，龚自珍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早在1935年，朱先生就在《现代史学》第二卷第3期发表了《龚定庵之史地学》，此后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并于1940年编成《龚定庵研究》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是第一本关于龚自珍研究的专著，共分六部分：《龚定庵别传》、《龚定庵之革命思想》、《龚定庵之掌故学》、《诗人龚定庵》、《龚定庵之史地学》和《龚定庵之金石学》，各部分既可独立成篇，又有机地联成一体。据其自序介绍，该书的特点是“皆论列定庵最擅长之学术，而又参人道者；此外各科，在定庵则为涉猎，在世间则人所共知，恕不具论”。该书至今仍是龚自珍研究的重要文献，颇受学界的重视，初版之后一再重版：商务印书馆1947年再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1972年两度再版，台北文星书局还有擅印本（见林远辉编：《朱杰勤教授著译目录》）；此外，笔者还曾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见到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的版本。其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在第三封信中，朱先生出借给王先生的《龚定庵研究》即台湾商务印书馆重版的本子，而目前可居室收藏的这本著作有民国版及台湾版两种。

王贵忱先生对龚自珍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酷好版本收藏的他在津门旧书店邂逅了著名的收藏大家周叔弢先生（1891—1984），从此成为忘年之交。在周老的指导下，王贵忱先生将收藏重点集中在地方文献、钱币文献以及龚自珍著作版本等当时不为他人重视的领域上。目前，他对龚自珍著作版本的搜集堪称私人藏家之冠，其对龚自珍著作早期版本的考证和梳理成果具见于《龚自珍诗文集早期刊本述闻》一文，于1986年至1989年间分六期连载于《广州师院学报》，被推为研究龚自珍著作版本考订最为详尽的著作。

据王贵忱先生介绍，朱先生对龚自珍的研究主要从历史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同时擅长对其诗文进行解读。由于其本人在传统诗文创作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他对定庵诗文的研究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对于龚氏著作的版本，则像多数学者一样，并没有太多的留意。相反，王先生则偏重于版本学的研究。但这种区别并不妨碍两人在这一研究领

域上的交流，正由于两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彼此在交流中更容易有所收益。朱先生关于合作编写《龚自珍研究资料》的建议，大概也缘于这一点。王先生一直有重新编写《龚定庵全集》的愿望，当年，朱先生闻知后曾欣然应允参与其事，这即第五封末尾所提及的“自珍诗文集新本”的由来。

在朱杰勤先生的建议下，王贵忱先生曾撰写了《龚定庵收集古钱币轶事纪闻》一文（发表于《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根据有关文献考证龚自珍的钱币收藏。1998年，为纪念朱先生，王先生特地对此文进行修订，并增加相关的背景资料，同时介绍了朱先生的第四封来信，扩写成《龚自珍与晚清钱币学——朱杰勤教授逝世八周年紀念》一文，发表于同年的《广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二

在朱、王二先生的交往中，晚清广东大儒朱次琦（广东南海九江乡人，世称“九江先生”）也是其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从籍贯来看，朱九江属南海人，朱杰勤先生则为顺德人。但两人其实为同宗，就辈分而论，朱九江先生是朱杰勤先生的族祖。

基于这个原因，朱杰勤先生对朱九江的事迹和学术也颇为留心，熟悉朱九江的著作和有关史料，并曾有专门的文章研究、介绍朱九江的学术。早在1937年，他已经在中山大学《语言文学专刊》第1卷第2期上发表《朱九江先生经说》。到了1987年，又在《学术研究》第4期上发表《朱九江学述》。据王贵忱先生介绍，朱杰勤先生在平时的交谈中，多次提及朱九江有明显的反清思想，而且认为其晚年自焚文稿也与此有关。可惜这种观点并未形成文字付诸发表。

1986年底，时任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的王贵忱先生正在创办《广州史志》，同时筹备创刊号的编辑工作，因此向朱先生约稿，朱先生遂在12月20日回信，以《简朝亮编〈朱九江先生集〉正误》一文应命。其后王先生将其发表在次年4月出版的《广州史志》第2期“岭表艺文”专栏。在这篇文章中，朱先生通过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缜密的分析，指出简朝亮编《朱九江先生集》卷七中所收录的《北行抵清远县寄季弟宜城书》并非朱九江所作，而是朱九江之兄士琦的作品。这篇文章内容简明，篇幅也较短小，但考证精详，若非对朱九江诗文和史料非常熟悉，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该文和前述的《龚自珍师友记》一样，都是《朱杰勤教授著译目录》所失录的佚文。

三

这五封信中，第一、第二、第五等三封均是朱先生在收到王贵忱先生寄呈请益的文章后所写的复信。从这些复信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朱杰勤先生严谨的学风和对后辈的厚爱。

1984年4月，王贵忱先生根据自己的藏品，结合著录材料，编辑成《三孔币汇编》一书，并自行影印出版，书末附有“后记”一篇。1985年，以“《三孔币汇编》后记”

为题发表于《陕西金融》第11期。次年，王先生即以《陕西金融》所刊载的这篇文章向朱先生请益。朱先生遂于10月11日专门复信，就其中一句话的表述方式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1989年10月，王贵忱先生将自己的部分文章结集，自印《可居题跋（第一集）》。朱先生在收到这本书之后，在回信中对其中一篇文章中出现的错别字进行逐一的订正。从这两封信来看，朱先生对王先生寄来的文章都是经过认真阅读和推敲，从不敷衍了事。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封信的时间，距朱先生去世仅三个月零一天的时间，这时的朱先生已是76岁高龄，而且身罹重疾，但依然如此认真地对待晚辈的著作。此外，他还亲自抄录张维屏的一首诗附在信的后面。这些细节不但体现了朱先生对后辈的关怀以及对其研究成果的尊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以及为人师表、诲人不倦的高贵品格。

在朱先生的信中，也反映了其他的一些事迹。如第四封是朱先生向王先生打听省中山图书馆、省博物馆和广州图书馆的有关情况，打算从石牌出到广州市区，查阅资料及探访朋友。从中可见当时的朱先生尽管因长期的足疾而导致行动不便，闭门谢客，但仍不忘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可惜这次拟议中的市区之行后来因先生足疾发作而未能成行。另外，我们现在可以信中“想出广州拜访您”之语，感受到近二十年来城市的巨大变迁。暨南大学所在的石牌，原为广州郊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尚未与广州旧城区真正联为一体。因此，当年朱先生打算从学校的宿舍到王先生所住的广州旧城区，就使用了“出广州”一语，就像现在黄埔区的居民，仍然将到广州主城区称为“出广州”。

综上所述，朱杰勤先生的这五封信无疑为后人研究朱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正如朱先生在信中两次引用的龚定庵名句所说的那样：“小小源流，动成掌故。”

附：信文及注释

（一）

王贵忱先生：

您好！

大作《龚自珍初刻本诗集〈破戒草〉》^①一文已拜读。此文对龚氏诗集版本，考证甚详，亦有确证。龚自珍题某书说：“小小源流，动成掌故。”此语可以移赠。谨珍藏以供参考。

此文可以加上版本插图，在专门刊物发表，以广其传。先生如有其他大作发表，自以先睹为快。

肅此鸣谢，顺候著安。

朱杰勤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

^① 刊于《广州日报》1986年5月7日。

- (1) 您是否在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
- (2) 请您告诉我市地方志委员会的详细地址。

(二)

贵忱先生史席：

前奉惠书，因事迟复为歉。

寄来《三孔币汇编》^① 后记一文，亦已拜读。大作考证精翔，博引诸家，折衷至当，佩服佩服。《三孔币汇编》一书，我未看过，无从献议。惟《后记》有二句：“李学勤先生去年途经广州，获闻三孔币赵铸说高见”，我读之不得其解。可能有误刊之处。如果根据文法，则获闻三孔币赵铸说是李学勤（他也是我的朋友），可是“高见”二字又无着落。如果是指你本人，就似乎应该作“使我获闻其关于三孔币赵铸说之高见”。如果在句后加上“而有以自信”，或“心目为开”等字样，就意思更为完满了。顺口雌黄，未必有当。

《屈大均资料集》^② 尚未收到。谨复即候著安。

朱杰勤手启

86/10/11

(三)

贵忱先生史席：

蒙向我征稿，现寄上《简朝亮编朱九江先生集正误》一文请审阅，修改。如合用就请发表，校对工作可由我本人负担。此文无底稿，收到后请复一音。

拙作《龚定盦研究》并请提意见，我只存一本，用后请送回。

岁晚，工作越来越紧，无暇外出。我本人还藏有清人书法真迹，如需用，亦可考虑。匆匆即候大安。

朱杰勤手启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住家地址：暨大苏州苑十七栋 301 号。电话：774511 转 707 朱。通讯地址：华侨研究所。

(四)

贵忱兄史席：

我们很久没有通讯和见面了。以前听说您有退出市方志办要职之意，未知您现在何

^① 刊于《陕西金融》1985 年第 11 期。

^② 当时王贵忱先生正主持编撰《屈大均全集》，原拟将相关资料汇编成《屈大均资料集》，后因故未果。